

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二)

刘克敌 著

茶与咖啡中的经济学

19、20 世纪之交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由此带来日常生活的极大便利。但凡只要有钱，就几乎没有办不到的事。“要吃外国菜，就直接去西菜馆，要吃中国菜，更其容易，说明广东菜、云南菜、福建菜、四川菜、徽州菜、北京菜，……等等，由自己任意拣选。并且，预备大吃，可以到大的菜馆里去，预备小吃，可以到小的菜馆里去，预备最低限度的吃，可以到小饭店里去吃。至于大菜馆和小饭店苦乐之悬殊，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大大小小的餐馆更是铺天盖地，文人自然也是“口福”不浅。施蛰存曾经还挨过穆时英的“教训”：“听说你出医院的第二天就在冠生园吃炒魷，我真替你担心。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贪嘴！”即便是刚出院，也不忘记跑去大菜馆饱食一顿，慰藉贫瘠的肠道，文人实在也是生活中人。

上海与杭州另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上海的茶楼并不兴盛，但是咖啡馆却十分流行。民国时期的上海文人多喜欢坐在西式的咖啡馆里畅谈文学诗歌，阳春白雪似乎在咖啡馆里才能够显得更加“洋气”，以至于很容易形成一种所谓的“咖啡文化”。留学西方或是日本的文人到上海之后，其日常生活方式即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如鲁迅在上海居住期间，也养成了喝咖啡和进电影院的习惯，他在最后十年间共观看了一百多场电影，出入咖啡馆的次数更是多得无法统计。

大抵，民国时的咖啡馆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标志，这在喜欢处处“赶

时髦”的上海人心里是心照不宣的。“咖啡店的布置，都趋重于西洋化，清洁而精致，并且选用妙龄女子充当招待，更能投青年人的所好，所以他们的顾客，也以青年为最多。”环境清雅，出入的顾客也必然多以着装正式的上流人士居多，这也是文人们愿意选择去咖啡馆的一个原因。那时比较有名的有马尔斯咖啡馆、大光明咖啡馆、马克咖啡馆、霞飞路的 DDS 咖啡馆等。张绪谔在他的《乱世风华》中记述当年 DDS 咖啡馆里的情形：

从楼梯上到二楼，才是喝咖啡的地方。由于名气大，位置适中，当时社会中上阶层凡是男女约会、谈生意，多喜欢在此坐坐，尤其文艺界人士喜爱这里别有异国情调的风格，几乎整天都座无虚席。情人间的默默相对、文人的诗情画意，加之楼下玩老虎机的声音，这就是 DDS 当年面貌的真实写照。……我曾在这里的吃角子老虎机上，中过此生唯一一次的 Jackpot 大奖，三个西瓜连成一排，一赔三百，真是幸运之极。

咖啡馆俨然成为文艺青年的所属地，大有如今所流行的“小资情调”。民国时期上海文人大都是通过写稿换取生活费用，他们自然要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由此，接触各种新事物（如看电影、逛戏院、打回力球、喝咖啡甚至打牌、骑脚踏车等等）就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1927 年，张若谷在《咖啡座谈》中如此描述当时霞飞路上颇有名气的巴尔干咖啡馆：

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为俄国人所设，这是我们在上海几家咖啡店中最爱坐的一家。我们一群，虽然都是自称为无产阶级者，上海最贵

族的 Marcel 与 Fedral 二家，倒也进去喝过咖啡，但是印象最好的，还是这座亚洲的“巴尔干”半岛。

记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彦长，田汉，朱应鹏与我，在那里坐过整个半天。我们每人面前放着一大杯的华沙咖啡，彦长还要来了两碟子似乎油煎肉饺一般的“片菜希基”，因为没有刀叉，我们就用手指夹着向嘴里送，田汉笑道：“像这样野蛮的吃法，同粗糙浓郁味道的食品，真是东方民族的一种特色。”大家说说笑笑，从“片菜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种问题上。

这样的场景不是例外。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都有文人和一些所谓“文学青年”研究文艺、谈论时政的身影。

周作人曾说，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之间的调和。然而物质的欲求也同样徘徊在满足与不足之间。欲求的永无止境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流失。刘呐鸥在致戴望舒信里就对上海生活发出这样的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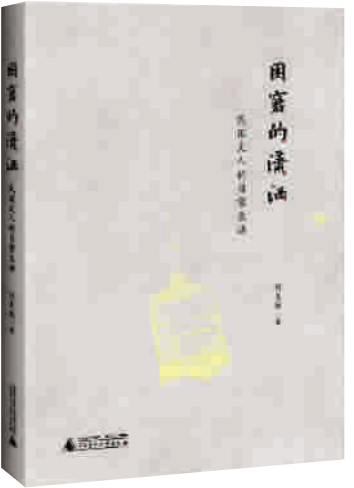
我要 faire des Romances，我要做梦，可是不能了。电车太吵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濛濛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塞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那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那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我们没有 Romance，没有古城里吹着号角的声音，可是我们却有 thrill，carnal intoxication，这就是我说的近代主义，至于 thrill 和 carnal intoxication，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

显而易见，生活在现代大都市

的上海文人，必然有着与杭州文人不同的气质，他们笔下所呈现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等就会存在差异。上海不仅是物质之都，也是新闻之都，任何事物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文人眼中，文人生活的多样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也造成了他们作品内容的复杂化和层次化；而长期生活在杭州的文人，则生活节奏的缓慢更多时候是带给他们闲适之感或思维的休憩。二者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他们创作中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施蛰存笔下会出现如此之多“性格女性”的原因，例如《散步》里刘华德太太，给孩子们必须买三友实业社出品的“二一二”牌布料，喝茶习惯将方糖放在红茶里。而在《手帕》一文里，他这样写道：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手帕对于妇女们的意义。我想，一方手帕之在妇女身上，与其说是一件实用品，毋宁说是一件像臂钏指环一样的装饰品。你没有看见妇女都把手帕拴在右腕下的钮扣间，或是把它折叠成为方胜的样子约束在臂钏中吗？……手帕被妇女们应用的时候，一定很少是抹拭涕洟用的。她们一颦一笑，要用到手帕；她们说一句话，要用到手帕，她们看一个熟人，要用到手帕，她们看一个素不相识者，尤其要用到手帕。总之，我们可以说她们善于在每一个动作中利用手帕，而她们的手帕也永远能够不辱使命，帮助她们增添许多妩媚。

这里的妇女们显然已不是个别的指称，而是泛指民国时期的上海妇女。原来实用的手帕在现代都市里却俨然成了一种装饰品，并且是



妇女出门前必不可少的装饰品，其作用不逊色于胭脂口红之类。这种习惯事实上也是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反映——摩登时代下的女人，前所未有地追求虚荣以满足自我的空虚。

陆小曼当年与徐志摩之所以最后决定驻扎在上海，就是因为这里是“唯一可以吸鸦片的地方”。陆小曼一到上海，“立刻卷入旋涡之中，故态重演，且愈演愈烈。酒宴，舞会，牌桌，戏院，一时间如鱼得水”。（高恒文：《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71 页）造成徐志摩最后悲剧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外，过于贪恋于上海的物质生活以及过分纵容陆小曼对都市生活的眷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根本上说，文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深度与层次，另一方面也极大制约了其创作和学术成就的发展。

摘自《困窘的清谈：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出版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34.杨锡缪：“百乐门”使他进入了历史

“百乐门”号称“东方第一乐府”。这个号称，倘若以建筑的外表来看，着实有点言过其实。也就是装饰艺术的风格，是跟随了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上海最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并没有无出其右的意思。若论高耸，“百乐门”是比不过外滩一带已高耸入云的沙逊大厦；如论雄伟，“百乐门”是绝对要输给也在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但若说到这个建筑空间中的内部，“东方第一乐府”则名不虚传、货真价实。

建筑共分三层，底层为厨房和店面；二层为核心区域，舞池和宴会厅；三层有若若干个小舞池，还有旅馆。舞池不止一个，最大的一个舞池设计成 500 平方米左右，舞池四周，有大量的镲材、水晶和白色木头装饰，视觉上十分富丽堂皇，堪称上海滩一绝。

说到舞池，就必须说到舞池的地板。这个地板大有来历，叫作弹簧地板。所谓弹簧地板，就是舞池地板并不铺实，下面有汽车钢板，当男女舞客在这种地板上随节奏而跳动时，直感觉自己的脚下如同踩上了弹簧，那微微的反弹感觉让舞步显得格外的轻盈灵动。

有一种说法，偌大上海滩，其时舞池已经不下数十以计，却只有三处地方安装了弹簧地板，它们便是百乐门、法国总会和扬子饭店。当然，以作者曾经的忘年之交，当年圣约翰毕业的新乐路郭小开的话来说，“那爱尔兰舞厅也是装有弹簧地板的，一旦跳将起来，这种踏波无痕的感觉，如同仙子飘摆”。

除弹簧地板，那“百乐门”吸引上海滩的还有三楼小舞池中的玻璃地板。舞池虽小，但灯泡极多，高达 5 万个，颜色又分红、黄、蓝、白、紫这样五种。节奏急促的音乐响起，便开红灯；节奏舒缓的音乐摇曳，就开蓝灯。总之是流光溢彩，绚丽异常，让那男女舞客翩翩起舞时，有太虚幻景的感觉，竟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除了舞池上的与众不同，“百乐门”还有与众不同之处便是竖立在建筑物上的九米高的圆筒形玻璃灯塔。

1932 年的上海，随着中产阶级的增多，那汽车不再是西方大班们的专利，来“百乐门”的，无论男女，许多人备有私家车，生意最为旺盛时，舞客的私家车从静安寺一路停到常德路，足有一二公里长。

他们两个，一个叫杨锡缪，是中国民族建筑设计师中的一位；另一个叫顾联承，是在 20 世纪早期的上海发了大财并跻身中国豪富阶级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原本没有什么可以交集，但命运偏偏让他们得以交集。

先说顾联承。他本是怡和洋行买办顾敬斋的最小儿子。但这个最小儿子也决非浪得虚名，所谓的子承父业，不仅让他祖上便已大有斩获的缙绅业再作一个发展，更将自己的智商与情商发展到房地产业、百货业和娱乐业，又开创了很大一派新气象。这个顾联承，还是个有相当鉴赏力的珠宝商人，与多少年后在中国大地上舍命一搏的“赌石王们”有的一拼，就因他的眼光犀利到了毒辣的程度，让他原就积累的财产有更大的膨胀。

1929 年，顾联承早已做大，但还是雄心勃勃地想着要有个新的投资方向。顾联承眼光一瞟，这就瞟到了戈登路（今江宁路）。于是，顾联承找上了杨锡缪。

历史没有对顾联承找上杨锡缪作过多的记载，只是说顾非常仰慕着杨。杨锡缪，字右幸，是鼎鼎大名的费孝通的舅舅。

他 1899 年生于江苏同里。家境自然还算优渥，这让他很顺利地就读了上海南洋大学土木工程科，1922 年获得了学士学位。杨锡缪是中国民族建筑师这个群体中很罕见的没有出国留学的一位，他不是海归派。毕业后，先在少年英才的吕彦直的上海东南建筑公司中当一名工程师，稍后，自己创办了上海凯泰建筑公司，既做老板又当伙计。1933 年 12 月 14 日，精雕细琢的百乐门舞厅正式开幕。开幕那日，上海市市长、同盟会元老吴铁城亲自到场，给足了顾联承和杨锡缪的面子。那“百乐门”就此横空出世，影响着上海市民生活数十年。

许多社会名流曾来到这里，其中便有东北易帜后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军。每当他来到上海，总会来到“百乐门”，与他最心爱之人赵四小姐在弹簧地板上轻歌曼舞。

19.江河出车祸了

市委办公室党组会议上，江河被责令写检查并给他下达最后通牒：“反省错误，悬崖勒马。如不悔改，从严处理。”

通牒被及时传达到江河家里，父母弟妹全急了。他母亲边照顾老伴儿，边组织一个阵容强大的亲友团。不但轮流上阵说服江河，也到了我的办公室。

江河的妹妹江雨是平安保险的文书，举手投足露出清秀内敛的气质。弟弟江海是高中体育老师，足有一米九，铁塔般健壮，言谈中有种疾恶如仇的侠气。两人态度友善、语调温和、谈话直奔主题。都希望我为其兄的前途，暂时跟他保持距离。他们强调，离婚归离婚，尽量妥善处理，尽量实行软着陆，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对这个合理化建议，我领首应诺。

每天去妈妈家的习惯被中止，家里的电话线被拔掉。整个金湖管理处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勤恳的员工了。早晨，最少提前一个点上班；中午，一个人在办公室吃个泡面；晚上，最少拖后一个点才离开。

三天后。办公室的电话再次响起，马平一手捂住听筒一边用征求的目光看我，我依然向她摆摆手。“对不起，洁雅不在。啥？你要来找她？好吧，等我看到她给你转达一声。不客气，再见。”

街口，红灯亮起，只有下车。忽然，叹息般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请给我一个解释机会，好吗？”回首，那是一张熟悉的、疲惫的、憔悴的面孔，是江河。“我们之间没啥需要解释的。”语气淡漠而疏离。“该来的终究要来，这是我的报应。我只求你最后一次陪我走走，最后一次陪我吃顿饭，行吗？”极力忽略掉心底忽然涌起的疼痛，板起面孔。“啥最后最后的？威胁我吗？”

回到自己家，看到桌上的票才记起早上临走时，田野曾告诉我，他们今晚在剧院与部队搞联欢，让我带甜甜去看演出，中午为躲江河没回家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这段时间，正常的生活秩序全被打乱。

“嘀铃铃……嘀铃铃……”刚插上线电话就响起来，心没有来由地慌张。“我——汪涵！快

到人民医院急救室，江河出车祸了！”倏然间，眼前交叉叠映的全是江河被车撞倒的影像。

天啊！不是威胁，他采取了行动……哦，不要啊，江河！冲出家门，狂奔到大街上，拦住一辆的士，冲了上去。一路上，一直在心里狂喊：“江河，求你别吓我！求你坚持住！只要你好好的，我陪你走，陪你吃饭，甚至陪你一辈子！”

当急促的脚步出现在医院走廊时，汪涵远远地迎过来。“咋样？他咋样了？”“正在抢救。”一名医生从急救室走出来。“谁是沈江河的家属？”“我是！”没有丝毫犹豫。“病人需要马上输血，你们当中有 O 型血吗？”“我就是！”

又粗又长的针头插进了我的胳膊，殷红的鲜血渐渐流进血袋，又顺着针筒缓缓地流进他的血管。

走廊的长椅上。我目光空洞，表情呆滞，汪涵拍我的肩。“放心，不会有事的。”“如果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不会原谅自己的。”“这只是个意外，懂吗？”“绝不是意外！下班时他在街口等我，说求我最后一次陪他走走，最后一次陪他吃顿饭……我竟认定他是威胁。我也曾不放心，折回去找过他，可他已离开了，当时就该继续找啊，可我……”泪水在脸上疯狂蔓延。

这半月出奇的安静。我的心却一直莫名其妙地被忐忑、恐慌、焦虑笼罩着，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吗？周日上午，家里的电话骤然响起。“汪涵？江河咋样？出院好几天了？那他……你让我去他办公室干啥？不好吧？风口浪尖的……那行吧，再见。”

门，虚掩着，我长驱直入。嗯？这一堆那一撮，那叫一个乱啊。江河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黑色扶手椅里，手拿一白色茶杯呆呆发愣。看到我进来，他嘴角扯起一道弧线，勉强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来了？请坐。”我在他对面轻轻落座。

“要搬家吗？”“小雅，我再也不会纠缠你了，你走吧，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

“为什么？”“因为我已注定无法给你带来幸福……”“发生啥事了？告诉我！”

“还是别问了……以后，你慢慢会知道的。”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

养女

刘洁

